

阿根廷裔作家赫尔南·迪亚兹的小说《信任》捧得2023年普利策奖小说类奖项。《信任》聚焦一位经历“1929年美国股市危机”，却依旧风生水起的金融家。迪亚兹在书中多次揭开了他是如何通过资本置换权力，进而用权力扭曲现实的全过程。组委会评价说，这部小说是“在资本为王的国家里，对权力与爱情展开的复杂审视”。

赫尔南·迪亚兹《信任》： 何为“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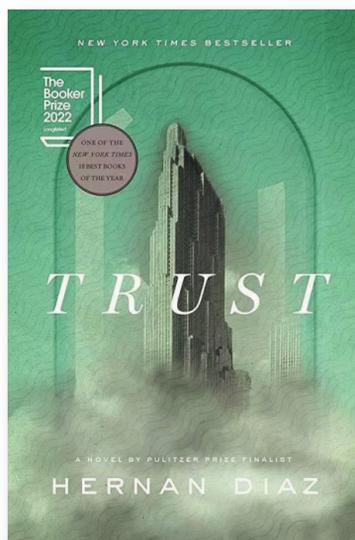
□张云秀 张建国

继第一部小说《在远方》(In the Distance)入围普利策奖之后，赫尔南·迪亚兹(Hernan Diaz)的第二部小说《信任》(Trust)终获2023年普利策小说奖。《信任》由四个独立部分构成，包括小说中的小说、未完成的手稿、回忆录以及日记，看似分散，实则紧紧围绕同一位金融大亨的事迹展开。迪亚兹借助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还原财富积累的过程，揭露金钱用于置换权力、掌控话语权进而扭曲现实的真相，试图探讨金钱与阶级的复杂关系。

描写美国上流社会的小说大多集中于剖析财富带来的痛苦与迷茫，如华顿、詹姆斯以及菲茨杰拉德等人的作品，极少阐明财富来源的细节。这是美国文学的一大“盲点”，也是迪亚兹尝试弥补的空缺。迪亚兹在《信任》中详细描写了安德鲁·贝维尔(Andrew Bevel)在喧嚣的上世纪20年代走上财富巅峰的全过程。此外，迪亚兹特别强调“侦探小说”的重要作用，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他说道，“侦探小说教会我们……这个现实不是给定的，而是需要被解读的。”《信任》需要读者对“真相”有敏锐的洞察力，明确四种不同体裁所起的作用。不同叙述者站在不同立场，有着不同诉求，因此，他们向公众展示的内容均有特定目的，且金钱多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读者需要在反复思考中深度挖掘：谁掌握话语权，谁可用金钱换取权力，重构现实。

《信任》展示给读者的“真相”是多层次和不确定的，每一部分都是对前一部分的反驳与修正，每一位叙述者似乎都更接近真相。第一部分为小说中的小说，由小说家哈罗德·凡纳(Harold Vanner)以金融大亨安德鲁·贝维尔为原型写就，呈现主人公本杰明·拉斯本(Benjamin Rask)完整的致富过程，着重批判1929年经济危机时本杰明的金融阴谋。凡纳在小说中将本杰明塑造为一个反英雄人物：他性格孤僻、冷酷无情，违背社会道德，忽视经济规则，操控金融市场导致股市崩盘。这极大地迎合了普通大众对金融大亨背后机密的想象，因此小说自出版以来销量极好。然而，贝维尔本人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凡纳的小说是对自己的诽谤与诋毁，并声称，他所取得的成功恰是其行善的证明。“未完成的手稿”由此诞生。“回忆录”由贝维尔的秘书伊达·帕滕兹(Ida Partenz)在老年创作，意在揭秘被贝维尔隐藏起的真相：其一，她帮助贝维尔创作“自传”是受生活所迫且忌惮贝维尔的权势，并非基于现实。其二，帕滕兹指出贝维尔收购凡纳出版社的控股权，下架小说，且确保在这个城市(或者在伦敦、新德里或悉尼)没有一个出版商或编辑会接受凡纳的作品。显然，贝维尔掌握绝对的话语权来重构自身形象。小说最后一部分为贝维尔的妻子米尔德丽德(Mildred)写的“日记”。看似由米尔德丽德自己完成，具有较高可信度，实则为帕滕兹的翻译本。至此，《信任》中的真相已全部重构。普利策奖评委会认为《信任》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它以过去的美国为背景，通过不同文学风格的相互关联的叙述，探索了财富、家庭和野心等主题”。

“不可靠叙述者”是迪亚兹用于揭示《信任》主题的独特写作策略。迪亚兹利用不同形式的嵌入叙述来实现叙述间不可靠性，从而不断重构事实。在这些叙述者中，没有一个人拥有更优越的地位和



知识来权威化自己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文本中相互冲突的多重视角建构，导致所有叙述者都是不可靠的。凡纳的小说一定程度上是对贝维尔生活的改编和润饰，但贝维尔在自传中也同样会选择描写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帕滕兹的“回忆录”看似为了揭秘被贝维尔隐藏的真相，实则是为其写作重新寻找素材。《信任》的每一部分都是完整的故事，表达完整的主题与思想，但它们都只是迪亚兹作品中的四分之一，且与后续部分描写的真相有较大出入，由此引发读者思考：谁才是真相的忠实讲述者？他们分别表达怎样的价值观？迪亚兹将不同的文学形式并置，形成强烈对比，看似是在揭示真相，实则借助不同形式的文学体裁表明——自传、小说、回忆录甚至日记都不是现实的直接记录，而是被建构的生活，都体现作者的意识形态，尽管凡纳的创作动机并不明朗。迪亚兹在小说中通过帕滕兹父亲之口，阐述了不同形式与真实性之间的微妙关系：

虚构无害吗？看看宗教。虚构无害吗？看看被压迫的群众，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足，因为他们接受了强加给他们的谎言。历史本身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战胜者的虚构故事。那么现实呢？现实是无限预算的虚构。就是这样。现实是如何获得资金的，通过另一个虚构：金钱。钱是这一切的核心。

可以看出，迪亚兹认为金钱是可以操控话语、改写现实的。“文学”都有其可信与不可信之处，需要读者自己把握。此外，帕滕兹的“回忆录”还体现了德怀特·麦克唐纳所说的“非常规新闻写作”。这种形式“既利用了新闻的事实权威，又利用了小说的氛围”。帕滕兹在“回忆录”开头将自己置于旁观者的位置，与贝维尔没有利益牵扯，以此增加其叙述的可靠性，而且，她作为贝维尔的秘书兼日记员直接参与过贝维尔的生活，这使她的叙述给人一种权威的感觉。但随着《信任》情节的深入发展，读者会发现，帕滕兹之所以重温这段记忆，是因为她认为“这些谜题必须悬而未决才能为我的写作提供素材”。可见，帕滕兹在利用自己的作者身份来实现创作自由。她受雇于贝维尔，为他创作“自传”，但由于贝维尔死于突发心脏病，“自传”并未完成。因此，已出版的以贝维尔署名的作品——《我的一生》，仍然存在很多不可信因素。

贝维尔自传中的碎片化写作手法，也是迪亚兹揭示人物真实心理的巧妙方式。尽管贝维尔声称，创作“自传”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米尔德丽德的形象，但其对米尔德丽德的描写篇幅并不多，且他在称赞米尔德丽德时，始终处于“上位者”的姿态。他从自己父辈谈起，为其暴利行为寻找合理解释，并为其借助金融阴谋取得的成就披上“改善后代人生活”的慈善外衣。而“自传”中关于米尔德丽德的故事只有寥寥数笔。

《信任》最大的特征是“现实”嵌套“现实”，“真相”推翻“真相”。“权力”与“历史”交叠，构成了《信任》的双重主题。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不断反问：谁拥有权力，他们如何获得权力，如何维护权力？历史是如何被决定和分享的，谁拥有讲述故事的话语权？迪亚兹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表示：“观点与权力有关，我们都希望有权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作者张云秀系郑州大学研究生，张建国系郑州大学教授)

书讯

近期，德国传记作家吕迪格·萨弗兰斯基创作的《荷尔德林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作为诗人、翻译家、哲学家、革命者，荷尔德林的一生都活在个人的和政治局势的紧张氛围中。在各种压力下，他最终精神崩溃，在图宾根的一座塔楼里度过了后半生。20世纪以来，经过哲学家和诗人对其思想的重新阐发，他的生命和哲学的真正含义才被发现，他也由此成为德国思想界一个神话般的存在。

2023年是荷尔德林逝世180周年。德国著名传记作家萨弗兰斯基用细腻的笔触再现了这位孤独诗人的一生。他从大量的历史资料和记录中透视出诗人生命中的困厄，用通俗、晓畅的传记写作手法引领读者接近这个世界文学和哲学经典中的未解之谜。

《法兰克福汇报》这样评价这部传记：“萨弗兰斯基不回避任何挑战，他把握住了荷尔德林与斗争的哲学立场，当他在一页纸上精确而清晰地解释康德的基本思想时，那么人们会感到惊讶……任何想认识和了解荷尔德林的人都应该阅读萨弗兰斯基的作品。”(宋闻)



阿根廷艺术家爱德华·斯托皮亚绘画作品

世界文坛

SHIJI WENTAN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 1899-1977)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美国俄裔小说家、文体家，其代表作《洛丽塔》(Lolita, 1955)一经出版便引发轰动，至今热度不减。除此之外，纳博科夫还钟情于写作，在半个多世纪里创作了诗作三千余首。借用《洛丽塔》开篇的表述，诗歌可谓是纳博科夫的“生命之光”。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推出了董伯韬先生译的《纳博科夫诗集》，无疑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品鉴纳博科夫诗情才意的绝佳途径。

纳博科夫其人

纳博科夫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的贵族家庭，除了作家身份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批评家、翻译家、昆虫学家。1919年，纳博科夫跟随父亲流亡欧洲，并在剑桥大学修读物理学及文学；1922年，父亲因政治原因被刺杀，他又辗转于德、法、美各国。曲折的人生阅历赋予了纳博科夫独到的审美风格与丰富的创作素材。其作品题材也很多元，包括小说、戏剧、诗歌、自传、非小说等。学界对纳博科夫的小说如数家珍，而对其诗歌的探讨相对较少。早在自传《说吧，记忆》(1967)中，纳博科夫就提到：“1914年夏天……写诗那令人愕然的狂暴第一次攫住我。”换言之，是诗歌最初唤起了这位15岁少年踏入文坛的悸动。随后，纳博科夫整理了68首俄罗斯诗歌并出版处女作《诗集》(Stikhi, 1916)，开启了极为高产的文学创作生涯。

纳博科夫钟情于诗，相继出版了俄文诗集《一簇》(1922)与《天路》(1923)，1929年的《乔尔布归来》收录了24首诗歌、15篇短篇小说。此后，他的诗歌产出放缓，直至1952年才打磨沉淀推出《诗集(1929至1951)》(Stikhotvoreniia 1929-1951, 1952)。《诗与题》(Poems and Problems, 1970)是其在世期间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包括39首俄文诗、14首英文诗、18个棋谜及解法。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纳博科夫诗集》中，大部分诗歌即选自《诗与题》。

纳博科夫在二三十年代前后的诗歌创作差异显著：前期的诗歌多采用抑扬格、严格押韵、每节四行；后期诗风则慢慢走出既定框架，在首步、韵脚、排版等方面逐渐多样，趋向散文化的自由手法。斯特鲁夫(Struve)评价道：“很少有诗人像纳博科夫这样在早期和后期有如此不同的风格。”总之，纳博科夫的作品以精妙的情节设计、真挚的抒情方式、富有挑战性的文字游戏而闻名，处处体现着对细节、平衡与美的追寻。

纳博科夫的小说创作亦是如此。他坚信，小说不应以道德教化为目的，读者所追求的不单是与人物共情，更要密切关注作品的艺术风格和结构关联，获得更为高级的审美享受。这种美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天赋》《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佳作。

纯粹而热烈

纳博科夫的诗歌与小说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蕴含的主题与思想相得益彰，互为影射。其诗歌风格简练且直接，感情纯粹而热烈，拒斥故弄玄虚的晦涩扭捏。后期的诗歌注重情节设计，避免单调的感性输出，也相应地为长篇小说的宏观架构奠定了基础。

纳博科夫的诗歌才华在小说《微暗的火》中可见一斑。小说第二部分以999行英雄双韵体长诗的形式呈现，体量宏大，用碎片化叙事拼凑出主人公约翰·谢德的一生，还暗中指涉了现实生活中作者父亲被误杀的创伤记忆，充满了生与死、艺术与生活、流亡与归途、信仰与文化等等母题的再思考。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诗人谢德的灵感顿悟常伴随着喷泉的意象，这在纳博科夫早期诗歌《音乐》(1914)中已初露端倪。诗歌共六小节，每节均提及喷泉，它象征了一个“奇诡的国度”，能够销蚀“险恶的阴影”。在充满创造力的想象之中，一切污浊、平庸都会被冲刷，取而代之的一个熠熠生辉、活力盎然的新世界。

小说《洛丽塔》的语言也极具诗意之美，男主人公亨伯特在杀死奎尔第之前即兴创作了一首悉数其罪行的审判诗：“因为你利用了一个有罪的人/因为你利用/因为你利用了我不利条件……因为你欺骗了我的赎罪……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因为我未做的一切……”一系列以“因为”起始的控诉句，戏仿托·斯·艾略特虔诚的宗教长诗《圣灰星期三》(1930)，讽刺了亨伯特的道貌岸然与奎尔第的伪善。无独有偶，在这部小说问世之前，纳博科夫曾经发表过一首情节十分类似的诗歌《莉莉丝》(1928)。虽然作者并未承认，但《莉莉丝》经常被视作小说《洛丽塔》的前身。

纳博科夫的诗作主题广博，从早期的爱情主题扩展至自然、信仰、流散、怀旧、创伤等等。这些主题也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了纳博科夫的小说创作之中。

纳博科夫注重从自然环境中汲取养分与力量，特别是通过蝴蝶这一载体，与大自然结下不解之缘。长篇小说《天赋》借费奥尔多之口展示了众多抒情诗，其中不乏对大自然的吟唱。比如，“冰雪，从山坡上消失，隐匿于沟壑，/彼得堡的春天/充满欢欣，充满银莲花/以及第一批蝴蝶。/可是我不需要去年的蝶，/那些褪色的冬眠者，/或者那些被捶扁的黄昏蝶，/飞过透明的树林。/虽然我不会辨认不出/世上最柔软的尺蠖蛾/的四片美丽的薄翼/平摊在一截斑驳泛白的桦树桩上。”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蝴蝶这一小小的生灵身上承载着诗人对家乡厚重的思念与对自由的渴望。不只此诗，“蝶”的意象在其他诗歌中亦频频出现，进一步印证了作为昆虫学家的纳博科夫对蝴蝶的偏爱。纳博科夫曾担任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馆长，有20多种蝴蝶以他命名。这种经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思想与美学理念。他认为，正如蝴蝶

《纳博科夫诗集》

□郭英剑 宋晓涵

那些被定型的灵感



两侧羽翼上纷繁精致的图案一样，文学作品也应注重微妙细节，讲求对称工整。

纳博科夫在20岁离开俄罗斯后再也没能返回，于是，他在诗歌中频频抒发对母国家园的思恋、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对漂泊流散的惋惜。比如，短诗《纹章》(1925)传达出对祖国的热爱与缅怀。诗人首句讲道“我的祖国刚一后撤”而非“我离开祖国”，将主语转化为本不会移动的“我的祖国”，透露出诗人踏上远离家乡的流亡之路实非不得已。此外，纳博科夫还在《我喜欢那山》(1925)、《行刑》(1927)中向魂牵梦绕的祖国频频呼号，在《柔柔的声响》(1929)、《致俄罗斯》(1939)等作品中不断印证对俄罗斯的一片赤诚之心。

纳博科夫的小说也反过来为其诗歌创作积蓄了灵感。比如，自传体长诗《声名》(1942)就采用了类似元小说的技巧。诗中有一节提到：“有首长诗，题目叫‘声名’，也就是说，/声名是作者焦虑的问题，/如何引走读者注意/这个念头让他烦恼不已……/‘连这一点，怕是，也会永远销声匿迹。’”在此，诗人跳出了诗行语域进行“显形”，打破了传统的行文规范，大胆阐发自己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诉求。

“找到”别样风景

在《纳博科夫诗集》“导言”部分，译者悉数纳博科夫的诗歌创作历程、背景知识、诗歌主题及其与小说的关联等等，将纳博科夫的众多诗句与相关研究观点信手拈来，读来如行云流水一般酣畅淋漓。这一方面，展示出了译者对于作者的软儒与熟悉；另一方面，也让读者见识到了译者厚重的文学功力与诗意底蕴。

为了更有条理地发掘纳博科夫这位被埋没的伟大诗人，《纳博科夫诗集》主体部分依据“德米特里·纳博科夫所译诗”、“《诗与题》中的俄文诗”、“《诗与题》中的英文诗”、“未收入《诗与题》的英文诗”四大模块展开，既明确划分了纳博科夫原作与其子译文的范围，又保留了纳博科夫本人对《诗与题》诗集中的编排次序。此外，以上章目所收录诗歌的时间跨度近60年，有助于读者对纳博科夫诗歌的主题及艺术手法演变进行纵向考量。

纳博科夫对语言游戏运用自如，这在增强阅读趣味的同时，也无形中加大了翻译的难度。比如《一次文宴》(“A Literary Dinner”, 1942)中的“I want you, she murmured, to eat Dr. James.”联系上下文语境可以发现，女主人其实是邀请诗人去和詹姆斯医生“聊聊”(meet)，诗人却佯装误听为去把詹姆斯“吃掉”(eat)。译本将此句处理为“我想请你，她喃喃着，吃吃詹姆斯医生。”采用“吃吃”这一表述，使母语为中文的读者读来便能立刻察觉出其中的不合常理，从而开始寻找语言迷宫的出口。再者，“吃吃”与“聊聊”、“见见”都属于叠词，很难说不是译者在为读者留存解谜的线索。此处如若将“eat”直接译为“吃掉”等表面意，那么，句子读来虽血腥却符合语法，进而有可能埋没诗人的良苦用心；如若直接加注点明作者想法，又会减少读者钩深索隐的乐趣。可以说，译者在上述两种选择之间达成了恰到好处平衡，使译文读来妙趣横生、惊喜不断。再比如，诗歌尾节的“her hobby was People, his hobby was Life.”被译为“她妻子/嗜嗜于人，而他则以生活为癖。”译者敏锐捕捉到“People”(人民)与“Life”(生活)二词的大写首字母，通过增译动词“嗜嗜”，“以……为癖”强化语气。“嗜”字为“口”字旁，也与诗中频繁出现的与吃有关的意象互为呼应。

《诗人》一篇中“直至，蓝而黑的枝柯间，/无星的夜找到它的轮廓”这句话同样值得推敲。在一般认知中，我们倾向于将广阔无垠的夜幕视作后置背景，而将枝柯看成前置主体。有意思的是，该句以“夜”作主语，并将其拟人化，从而把它的活动定格在地点状语——“蓝而黑的枝柯间”。这种处理方式反转了大众认知，营造出一时陌生的视觉效果，再现了原作的意境之美。这也微妙印证了题目“诗人”的特质：诗人总能打破常规思维，“找到”别样的风景。《诗》一篇中“而是那首诗，它从未知的高原奔流直落——当你等待岩石自深处喷薄，/而去寻求你的笔，/随即战栗，随即——”将诗人灵感迸发、提笔成诗的瞬间刻画得淋漓尽致；原文中诗人的最终产出“a silent, intense, mimetic pattern of perfect sense”被译成“静默、激昂，无上之意的拟型”，富有诗意且精炼准确，再现了纳博科夫眼中诗歌的本质。种种妙译，不一而足，读者能在这些妙趣横生的文字中收获对于诗、诗人、自由的崭新体悟。

(作者郭英剑系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晓涵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